

龚澎印象 宋以敏

蒋抑卮与鲁迅的交往 蒋世承

被误认的「致远」形象 陈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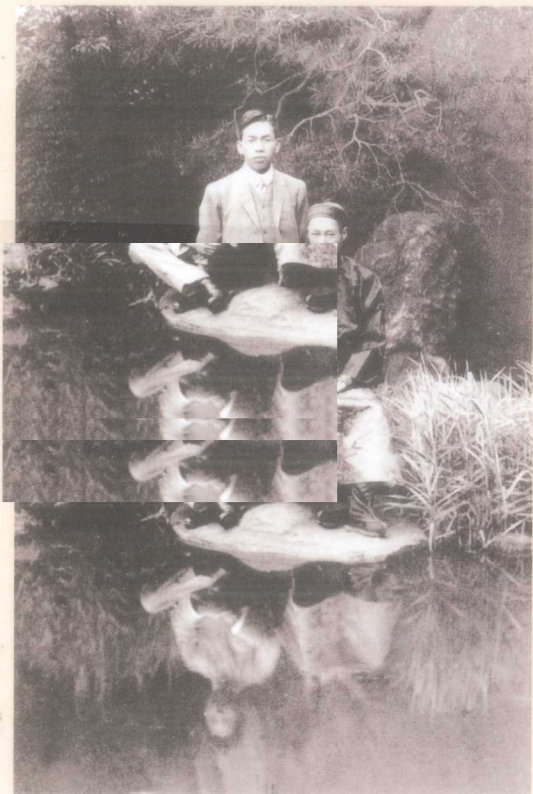
一个冬天的故事 朱新地

一位志愿军老战士的珍藏 袁质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老照片

OLD PHOTOS



龚澎印象 宋以敏

蒋抑卮与鲁迅的交往 蒋世承

被误认的「致远」形象 陈悦

一个冬天的故事 朱新地

一位志愿军老战士的珍藏 袁质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老照片

OLD PHOTO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照片.第73辑/冯克力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74-0167-5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现代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9402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140×203毫米

6印张 114幅照片 120千字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5.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出版人 郭海涛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第七十三辑

目 录

宋以敏	龚澎印象	1
蒋世承	蒋抑卮与鲁迅的交往	23
蔡登山	张大千在艺坛文友间	33
胡 剑	朱德故乡行	51
陈 悦	初	63
戴 煌	追寻夕照牧	75
孙庆忠	黄淑娉与畲族民族识别	82
李承言	母校的变迁	90
刘润辉	从一张爸妈的照片说起	96

朱新地	一个冬天的故事	106
金联波	难忘的聚餐	121
陈中惠	一张知青合影	124
赵明凡	我的第一张照片	126
袁 质	一位志愿军老战士的珍藏	128
乐美素	我的母亲仇瑞棣	146
聂永正	为我家撑伞的母亲	160
赵 纲	迟交的作业	163
姜东平	长春武斗罹难者及墓地述略	170
伊 格	普种牛痘 消灭天花	181
冯克力	“政治正确”与“历史空白”	187
封 面	鲁迅年轻时与友人的合影（蒋世承）	
封 二	松花江畔的游船（秦风老照片馆）	
中 插	八十年前的济南模范监狱（秦风老照片馆）	
封 三	祖母和她的两个孙女（叶湘筠）	



龚澎印象

宋以敏

1949年11月新中国的外交部成立，我进入新闻司工作，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在这期间，新闻司首任司长龚澎对我的影响很深。虽然一直都是隔层接受龚澎的领导，但我和她的个人接触也还不少，特别是在1959年张闻天被打倒以前。我自己，结婚后有时和先生何方一起，曾多次去她家里看望她和乔冠华同志，也不只一次应邀到她家作过客。1953年春，乔冠华正在朝鲜，龚澎的身体不大好。新闻司的领导要我下班后住到她家去，帮助照顾她一下。那时她住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委员会，即现在对外友协的院子里。龚澎和我更多地谈起她的一些经历，给我看了她的许多照片，使我对她的尊敬增添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内容。我结婚时，龚澎送给我们一个多层木盒，我保存至今。我生大儿子坐月子时，龚澎到渤海饭店宿舍来看我们母子。儿子半岁多时我抱他去看龚澎。后来龚澎家里有了一个光脑袋的玩具男娃娃，问我，这像不像你的儿子？记得有一次何方和我一起到她家，还是小婴儿的松都正好刚洗完澡躺在妈妈的大床上。乔冠华和龚澎要我们先去看看可爱的小松都，说这是家里最好看的节目了。



1960年代的龚澎

和龚澎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相隔二十年整。在这二十年里，除了从1953年春到1955年初在驻苏联使馆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外，我一直在新闻司从事国际形势动向调研，也就是说，我始终在龚澎的主管范围内工作，并且不断地得到过她的直接指导。初次见到龚澎是1949年的11月初，在外交部成立之前的一天。那是

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思想和外交业务培训，我从外国语学校被分配到新闻司的前身，当时叫情报司的时候。那一天，我和另外五位外校同学一起前去报到，受到了龚澎的欢迎。她的热忱和亲切，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同她的距离。最后一次见面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11月初。外交部的一大批干部和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交部的湖南“五七”干校。在前门火车站，正当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车厢的那一刻，看到这时已经获得“解放”的龚澎来到站台欢送下放干部，我就前去同她握手道别。当时已有长期下放的思想准备，虽也感到以后见面不大容易，但没想到这一握别就成了永诀。

从龚澎身上，我在多方面受到教益。她的一些言行始终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新闻司的特有工作氛围

出于对解放前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干部的普遍崇敬，更因为龚澎对我们这些新干部表现出来的那种关怀、信任和尊重的态度，一进情报司，就感到能在她的领导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如果说我对老同志们普遍有些敬而畏的话，对龚澎却只有敬重，而没有产生过惧怕的感觉。

龚澎对下级没有一点架子，对谁都那么友善、那么平易近人。她从不做什么说教，甚至时不时地自我调侃一下。她客观上起到的言传身教作用，并不是她的主观追求。从工作到生活，她关心司里的所有同事，还体现出女性领导特有的温暖和细致。而这一切都出于她的本性，因此非常自然。年轻同志不仅把她当作良师益友，还把她视为一位品德高尚的长辈，连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也都会毫不迟疑地向她倾诉和讨教。

情报司成立时，位于外交部街的老外交部西楼还没有最后装修好。我们先在东楼楼下的两间房子里办公，龚澎连个单独的办公室都没有。过不多久，我们就搬到西楼去了。起初的一两年分到的房间还是不多。龚澎倒是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可房间不大，还夹在负责外国记者事务的一科和从事调研工作的三科（上世纪60年代初，科才改为处）之间。龚澎出来进去习惯地经过三科。别人来找她也都经过我们三科的办公室。例如愿意让别人称他为“家老”的陈家康同志，每次来找龚澎，一进三科的门就会叫嚷：龚老太在不在啊？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那时都不到四十岁。乔宗淮有时也由阿姨带来找妈妈。就这样，这两年我们每天不知要和龚澎碰上多少次面，随便聊聊也

就成为常事。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新闻司，可以说既是个工作单位，也是个集体生活的大家庭。大家除了回宿舍休息，其他时间基本上全在司里，连假日也是大家一起在大食堂看电影、司里几人结伴或全司出游。遇到后者，龚澎同志有时也参加。司里每有同志结婚，一定会成为全司的喜事，许多同志都会被卷进来，包括帮助打扫和布置新房。记得陈辉、陈秀霞结婚时，龚澎就拿了个录像机忙着给他们俩、陈秀霞的父母和司里的同志录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录像机，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活动影像。龚澎一直有当一名新闻记者的意愿。就是从她对摄影的爱好和技术掌握来看，她也是早就具备了当一名优秀记者的条件的。司里来新同志、已在司里工作过一段的同志被调出



1939年，龚澎（右一）在八路军总部陪同朱德会见国际友人。

去，开欢迎和欢送会，龚澎只要有时间，是一定参加的。

在新闻司，上下级关系不仅融洽，而且还有点儿“没大没小”。吃饭分大中小灶、着衣有布料呢料之别、科员坐硬椅子科长司长坐软椅子等几项待遇上的小小差别，完全没有在我们的心目中形成多么严格的等级观念。表现在彼此的称呼上，在司里没人互称官衔。对龚澎，大家都称她为同志，她当了部长助理以后也没改口。刚从海外归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比如浦山，按照美国习惯，一开始连同志两个字也免了。我们对副司长、科长和副科长，或是直呼其名，或是叫他们“老”什么“小”什么的。对我们这些小青年，龚澎同志一律在姓氏前面加上个“小”字。在龚澎的领导下，情报司的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主、平等和亲切的气氛。看来，这同情报司的干部大都来自白区、且属知识分子型分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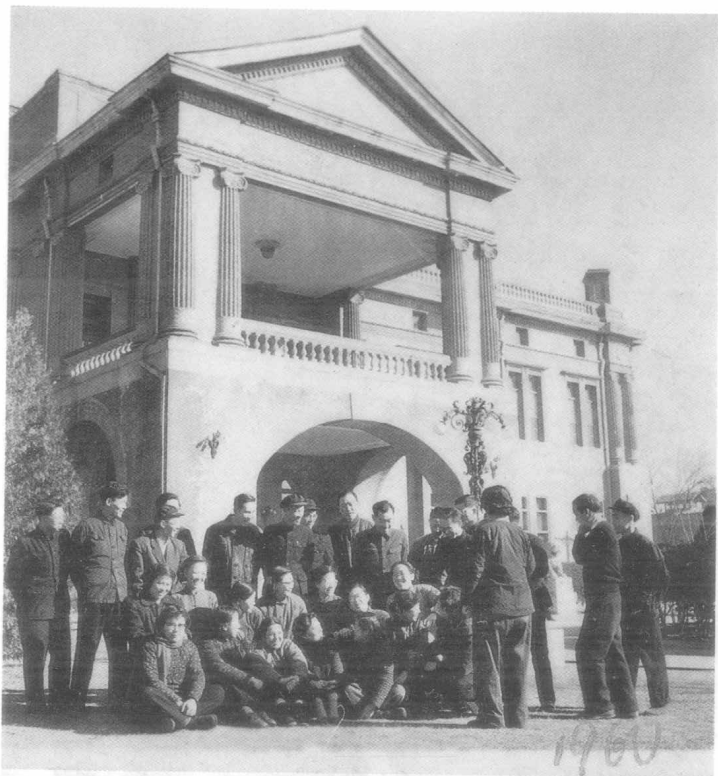
1951年秋，为了能最快地读到英美报刊关于朝鲜战争的报道和评论，司里在我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设立了一个站点。当时东西柏林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我们在东柏林让东德司机迈耶先生每天去西柏林取回所订阅的西方报刊。这样，就可以读到当天的消息了。我被派往这个站点，一共呆了一年半的样子。当时的驻外使馆，从大使到各级外交官，军队出身的所占比例较高。在部队里，下级习惯于把上级称作首长，如连首长、团首长等等。在这个使团里，下级对上级一律称外交官衔，也就毫不足奇。有的上级甚至对下级也按职务叫，例如“王翻译”、“朱会计”等。从情报司来到这里，我就不大习惯了。第一次到国外工作，就好比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很自然就常给可亲的龚澎写信，和她谈思想、见闻、感受。信里什么都说，连配个什么架子的眼镜也向她

报告，还画上图样征求她的意见。根据我当时的处世水平，信中大概是会提到使团的种种规矩和我的感想的。龚澎也给我回过信。记得其中一封就回答了新眼镜样式。那时候驻外使馆人员的来往信件不仅不能通过邮寄、全得由信使携带，而且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收到的和发出的信件，都要由指定的专人先读一遍，然后才交给收信人和信使。当时在使团担任二秘的许文益是信件审查人，他就读过我的来往信件。由于他是何方当年在延安俄文学校的同学，我们两家很熟。好多年以后，一次在聊天时，他偶然地谈起龚澎当年和我的通信，对这些通信所反映的情报司同志间相处的气氛印象很深，但却看不大惯，认为新闻司的风气不大对头。

在这里可以岔开说点相关的情况。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班子，骨干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部队出身的老红军和“三八式”，他们大都被派往驻外使领馆工作。第一批大使基本上全是老红军，被称为将军大使。一部分是在白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他们成为外交部机关的第一批骨干，办公厅和地区业务司的首任主任和司长、副司长。一般干部则是从在校大学生里挑出来的，他们不是地下党员就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没有到任的首任亚洲司司长夏衍、已决定分配到情报司来的熊健，都在地下工作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熊健是国民党政府北平市长熊斌之子，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起过和傅作义之女傅冬菊类似的作用。来自白区和在校学生的干部受过正规教育，基本上都出身于旧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兼任外交部正、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李克农，正是白区地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十分了解在他们领导下的这些白区干部。但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高层就对白区地下工作者做出了今后要控制使用的党内指示。周总理也深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



1949年10月1日，龚澎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0年，新闻司同事在外交部东楼前合影。背对镜头者（右三）为龚澎。前排右一（半欠身者）为本文作者。

的看法。根据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总理既大量吸收这样一批干部，又对他们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外交部一建部，总理就对外交部和外交部干部做出那样一套独特的规定。例如在干部职务安排上十分明确：领导干部到外交部来一定要降一级，特别是从白区来的。老革命阎宝航在地下工作中功勋卓著，当了多年的办公厅副主任，硬是不能当个大使，便是个突出例子。总理规定外交部“授权有限”，说外交人员是“文装的解放军”，针对性也很强。从给外交部全体人员第一次做报告时开始，总理就一再结合他自己的家庭出身和革命经历，

语重心长地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和重要。我们这些新干部第一次听后都非常震动和无比感动，个个下决心认真自我改造。常有来自其他单位、特别是地方上的朋友很不理解地问：像我这样一个有着父亲在台湾这种海外关系的人，怎么能长期留在外交部门工作？我总是回答：在外交部特别在新闻司，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干部不少；我们很幸运，在受总理亲自领导的外交部工作。其实不光是外交部，解放初期在安全和公安部门，也有大量骨干是原来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但是在政治运动中，外交部的干部路线还是常常成为一个话题，在新闻司尤为突出。龚澎就屡屡在“喜欢用什么样的人”问题上受到质疑。

“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新闻司

我在新闻司的这二十年，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每次运动，新闻司几乎都处于风口浪尖。例如反右派运动，部里各单位中，新闻司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所占比例就很高。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的领导下，知识分子成堆的外交部一共只打出“右派”二十多名，占外交部总人数不超过1%到1.5%，在国家机关中比例是最低的（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占五百万知识分子的11%）。但是，新闻司在其中竟占八个之多，还不算划为严重右倾后来也被调出外交部的人数。这和前述新闻司干部的组成情况不可分。“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司无论在前期还是中后期，“左”得也突出。龚澎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时，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她的主要问题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干部路线，说在她的领导下，“新闻司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副处长以上干部无一例外，全都出

身于旧官僚或资产阶级家庭。”到“文革”中期确定新的工作班子时，“文革”前的中层干部，无一在新闻司得到留任。

新闻司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高度紧张的。拿三科来说，在文字信息来源又少又慢时，好几位英文程度很高的同志，每天不知要收听多少个钟头的外台新闻，听后要立即编写出《快报》和《临时通报》，尽快送给中央领导参考。在文字信息来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之后，大家每天又不知要快速阅读和消化掉多少篇幅的电稿和外报外刊的报道评论。处理过的材料每天都以麻袋计。我们的正常工作时间从来都是从上午八时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这自然要求大家天天高度集中精力，非常努力地提高各方面的业务水平，包括中英文水平。事情那么多，能胜任工作的同志实在拨不出多少时间去做业务工作以外的事情，例如脱产参加运动和劳动等。业务不太忙的同志情况有所不同，存在忙闲不均的现象。这就使新闻司内部对工作的方针任务长期意见不一。“红”与“专”的关系摆没摆正？什么样的干部应该更多地受到使用？成为司里的主要矛盾，每次大小政治运动中的主题。作为一司之长的龚澎，自然是矛盾的焦点。无论在运动还是工作总结中，给龚澎提意见，总是有“重业务、轻政治”这一条。记得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期的大鸣大放阶段，周总理曾到新闻司办公室看司里所贴的大字报，其中有不少就是讲龚澎“重才轻德”的。我当时就站在总理的背后，看到他微笑着注意地读这些大字报，读后一言未发。在当时，摆不正“红”与“专”的关系可以被上到多高的纲，是可想而知的。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在司里还曾集中发生过一次大争论。

在我被调到驻苏使馆工作期间，曾间接地卷入了这场争



1950年2月，作者（前右）与同事在外交部西楼前。

论。1954年上半年，外交部机关党委领导张越同志路过使馆，在食堂里一起用餐时告诉我，新闻司不久前开了十九次支部大会，有一批同志批评龚澎重才轻德，对老区来的老干部重视不够，批评得很厉害。我听后感到的不解，但也不便多问。日内瓦会议1954年6月休会或7月结束后，龚澎和新闻司的任以沛、周湘浦一起，在从日内瓦回国途中再次路过莫斯科。因为心里挂着这个巨大问号，我在陪老任和小周两人上街购物时问起这事，但他们两人都是含含糊糊的，什么也没说。谁知这一问，竟给龚澎惹下了不小的麻烦。1955年1月我从使馆回来后去看龚澎。她一见面就问，是怎么知道开支部大会这件事情的。得到回答后她如释重负，说这下子就好了，因为有人指责她一定是通过新闻司某个党员向我这个非党员泄露了党内机密，并因

此对她提出了新的批评。这使我了解到新闻司里的争论有多激烈，对龚澎造成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新闻司集中了相当一批业务和语言水平都比较高的干部，才取得当年屡屡受到周总理和外交部领导肯定的工作成绩。反右派运动后把那么多有才华的工作骨干调走，使新闻司的工作水平当即大大下降。主管新闻司的副部长罗贵波曾专门到三科来讲了一次话，明确表示，不可能对你们提出像过去那样高的要求了，你们得好好努力。新闻司和龚澎本人显然都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受害者。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她本人也受到了批判。

但在这同时，在另外一些场合，龚澎也参加推行这一路线。例如，在“文革”一开始，作为部党委成员，她参与决定打倒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部党委委员孟用潜；在一次主持批斗孟的大会后总结说：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而大会声势之大和斗争形式之激烈，后来再没有被超过。这是外交部“文革”期间制造的第一起冤假错案。在同一个人身上，尤其在担负领导工作的人身上，既受过伤害又参与伤害过人，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头的普遍现象。我自己就是。“文革”初期在部领导主持运动时期，新闻司出了个有名的“黄、林事件”，即两位小青年因率先造反而受打压的事件。我那时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右”加“反右倾”的运动，觉得黄、林要是放在1957年，必是右派无疑。在当时主管新闻司运动的部领导龚澎和司长秦加林的领导下，我们几个处级干部出面对他们两人进行了批判。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更曾在新闻司副司长徐晃的指挥下，参加了私自打开一位受怀疑对象的办公桌抽斗、偷看他的日记的行动。这位副司长当时曾因此受